

正确理解和引导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沈湘平 刘志洪

【内容提要】促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不仅要努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且还要正确理解和引导这种需要。回顾思想史可以看出，美好生活与幸福内在一致，指向人们对于生活肯定的、愉悦的、质的感受，是一种良性的、理想的存在状态。当前我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高度复杂性，以前没有被突出的“软需求”逐渐上升为刚需，并呈现出显著的比较特征，但一些重要因素却没有被广泛认知。而且，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永无止境，不同阶层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有共同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我们必须引导人们严肃地对待美好生活的诉求，从思想与现实角度正确理解“美好生活”，更加注重人自身的全面发展，重视大众文化对美好生活的影响，在实现中国梦超越“美美”冲突以创造共同的美好生活。

【关键词】社会主要矛盾 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

作者简介：沈湘平（1971-），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北京文化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博士生导师（北京 100875）；刘志洪（1982-），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博士后（北京 100872）。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早在中共十八届中央领导机构成员当选之初就已宣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十九大报告开宗明义：“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而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十九大报告中14次提到“美好生活”，5次提到“幸福”，并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继续奋斗”^①结束。可见，究竟什么是美好生活？这是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与使命，准确把握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同时，现实中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本身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我们不仅要通过改革、发展努力加以满足，还必须加以正确引导。

一、何为美好生活的思想史理解

在汉语中，“美”“好”都是会意字，《说文解字》分别解释道：“美，甘也。从羊从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好，美也。从女子”。也就是说，“美”本意是羊大肥美，“好”本意指女子貌美。“美好”二字并用，最早见于几乎同时代的两篇著述中。在《庄子·杂篇》中，形

* 本文系2017年度北京市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化发展基础理论研究”（17ZDA07）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1页。

容盗跖“生而长大，美好无双”，“长大美好，人见而说之”；在《九章·抽思》中，屈原反复咏唱“憍吾以其美好兮”。两篇中的“美好”都是指容貌漂亮，后来含义才发生了引申。总体上看，在汉语语境中，“美好”一直用以表达带来愉悦心情的物事，美好生活就是能带来愉悦、快乐的生活。这与中国文化悦纳万物、享受生活的乐感特质有着极大关系。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古代思想史中的各主要流派都围绕美好生活及其实现展开了思索和筹划。《诗经》率先期待“民亦劳止，汔可小康”的“小康”生活，期盼能够“适彼乐土”。《礼记》描绘了“大同”景象：“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儒家的美好生活理想。老子则推崇“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状态。这些都表达了古代中华民族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和向往。

在西方，何为美好生活以及美好生活何以可能，从古希腊开始就一直是伦理学、政治哲学的主题。苏格拉底强调人生的省察，将哲学视为美好生活的向导，认为追求智慧的生活才是美好的生活。亚里士多德则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对美好生活及其何以可能作了系统的经典论述。综观亚氏的论述，美好生活是人们在拥有中等财富——一定的生活必需品（即他所谓的外在的善）之后，经过深思熟虑选择的生活方式和活动；这种生活不是手段，而是以自身为目的，是最高的善，是人们追求的终极意义，是“eudaimonia”（幸福）。他认为，大多数人，无论是一般大众还是出众的人，都会把幸福理解为生活得好。换言之，美好生活和幸福是内在一致的。从其词源上讲，“eudaimonia”包含“eu”（好的或善的）和“daimon”（神灵、守护神），亚里士多德强调，最完善的幸福是只能以人自身中神性的东西才能过上的生活，“即使幸福不是来自神……它也仍然是最为神圣的事物”^①。可见，与中国偏重感性相比，西方从一开始对美好生活的理解就有一种神性、灵性的维度。亚里士多德还进一步指出，幸福美好生活不等于物质满足，最幸福美好的生活是智慧或沉思的生活；幸福美好也不等于消遣和快乐，而是合乎德性的活动，也就是说幸福美好不仅在于活得好，还要做得好；幸福美好不能靠运气和恩赐，而要靠学习和实践；幸福美好不能只靠个人达到，而必须在公共生活中，由政治学来把握。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美好的理解在西方文化中至关重要，影响直至今日。

在基督教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中世纪，思想家视上帝为幸福美好的本原，认为人只有通过接近上帝才能获得幸福美好。启蒙运动以对基督教的批判事实上开启了近代西方对幸福美好生活的重新理解。经过启蒙运动，人们形成面向未来的现代性信仰，今胜于昔、未来优于现在、无限进步的乐观信念和可以计量的科学理性观念，开启了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现代化进程。其中内蕴着对发展的追求，但这种发展长期以来被理解为经济增长。这带来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身的诸多严重问题，并引起了人们的反思。追求真正的美好生活或良性生存内在地构成了当代西方哲学家思索的焦点。胡塞尔强调回归“生活世界”，海德格尔期待“诗意地栖居”，弗洛姆呼唤“重生存”的生存方式，马尔库塞主张“审美革命”，哈贝马斯反抗“生活世界的殖民化”，等等，都是如此。对发展的反思也使得发展伦理学应运而生。与阿马蒂亚·森提出要“以自由看待发展”的观念不同，德尼·古莱在其名著《发展伦理学》中鲜明地指出，发展主要涉及的是有关“什么是美好生活”的内容。他认为，“虽然在某些方面，发展本身是追求目的，但在更深层方面，发展从属于美好生活”，而“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与自由”是人们追求的美好生活目标；美好生活必须通过发展

^① [古希腊]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5页。

“拥有”足够的物品，但物品富足并不等于美好生活；美好生活和幸福根本一致：“如果不联系人类幸福的内涵，就不可能做出生活质量高下的判断”。他认为，“在伦理道德上合情合理的唯一发展目的是使得人们更加幸福。这也是在伦理道德上合情合理地不要发展的唯一目的”^①。

马克思恩格斯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本质上就是为人类争取美好生活的事业。马克思在高中阶段就立下为全人类幸福而奋斗的志向，认为“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历史把那些为共同目标工作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称为最伟大的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②。这也成为马克思一生的注脚。青年马克思还从哲学人类学的高度指出，“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却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固有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③。事实上，马克思提出了一条人类追求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普遍原理：人只有超越动物本能的需要，反思性地遵循美的规律亦即按照自由的规律（任何一个种的尺度）进行实践，生活才可能是真正美好的，这也才是真正的人的生活。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需要受到资本的深刻宰制，沦为非人的需要，甚至异化成为资本的需要。结果，人的生活变成一种非人的、物的生活。“人不仅没有了人的需要，他甚至连动物的需要也不再有了”，国民经济学家“把工人的需要归结为维持最必需的、最悲惨的肉体生活”，“把这样的生活宣布为人的生活”^④。在马克思心中，全面的、高级的、美好的需要构成真正的人的生活的本质维度。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必须被超越，就在于它从根本上扭曲或消解了人的美好生活需要，从而也彻底抛弃了实现真正美好生活的可能性。推翻资本主义、扬弃异化，正是为了告别人类的“史前时期”，使人们真正的美好生活成为可能。

成熟时期的马克思认为，真正理想的美好生活是建立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交往普遍化、人民觉悟极大提高的基础上的，每个人都得到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即“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⑤。真正的幸福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而是整个人类的解放；这种幸福美好不是天堂的允诺和应该确立的状态，而是通过改变现存世界的现实的共产主义运动逐渐达到的；当然，达到完善的幸福美好需要经过不同的阶段，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目前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从根本上说，作为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积极扬弃，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让人们过上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真实美好的生活。实现人民的美好生活和人类的自由解放是同一个历史进程。这也构成了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一以贯之的深层逻辑主线。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完成了使人民获得解放的历史任务，为中国人民的幸福美好奠定了根本的前提。40年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让中国人民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美好生活，特别是物质生活方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为人民谋幸福、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生动体现。

总的来说，美好生活（good life）与幸福（well being）虽各有侧重，但本质一致，都指向人们对于生活积极肯定的、愉悦的、质的感受，是一种良性的以至理想的存在状态，是人们生活的意义所在，其他一切都不过是这一状态的具体展现，或者是实现这一状态的手段。无疑，当代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追寻与创造，一定有其特定的情境，但都应该以上述公共理解作为前提。

① [美] 德尼·古莱：《发展伦理学》，高钰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43、49、24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5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5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4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22页。

二、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现实复杂性

当前,我国已经基本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了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已经从站起来、富起来进入强起来的新阶段、新时代。这就意味着,人们幸福美好生活需要的物质保障已经基本具备。或者说,事实上,人民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美好生活,他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其实是对更美好生活的需要。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一方面,人们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①;另一方面,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质言之,当前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是新时代较高层次的美好生活需要。在当前考察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我们需要特别注意其具有的如下几个特点。

1. 以往没有被突出的“软需求”逐渐上升为刚需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需要就是人的本性,历史的发展与人的需要有密切的关系,因为需要的丰富与提升是人们生活和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标志与动力。同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进步相伴随,人们的生活需要也逐步丰富和发展起来。例如,人们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以及安全感、获得感、幸福感的需要,特别是尊严、体面、自由等主观色彩很浓的需要,还有提升自身文化素质、追求全面发展的需要等日益凸显,这些成为衡量生活是否美好的重要因素,而不再是简单的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这些“软需求”只有被充分地尊重、理解和满足,人们的生活水准和生活满意度才能有明显的提升,而这又将反过来促进社会的安定、和谐与发展。否则,即使经济发展了,人们对生活的获得感、满意度和幸福感也可能停步不前,甚至还可能出现倒退。我们做工作必须说服人,掌握群众。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说服人 [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②因此,转变观念,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这些新的变化入手,我们的工作才能更加顺利地展开并富有成效。当然,同时也必须注意到,以往的“硬需求”或者说物质需要仍然存在,并将持续变化与发展,也不能忽视和松懈,而应给予更高水准的满足。它们不仅是美好生活的基础性维度,而且构成“软需求”及其实现的根基。

2. 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具有比较的特征

比较不仅是生活中的常事,而且对生活本身同样适用。人类总是生活于对其比较之中,在很大程度上,幸福美好生活就是比较出来的。一方面,人们的美好生活、更美好生活是与自己的过去比较而言的。在人们拥有比以前更好的生活之后,就会把这种更好的生活作为生活的“常态”加以确认,认为它是理所当然的,一切不符合这种“常态”的生活细节都被视为反常。这种比较具有强烈的不可逆性,以致任何细小的倒退都可能被看成极大的不美好。因此,持续提升人民美好生活水准也就成为政党执政、阶级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内容。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在一个信息日益公开、透明的时代,人们的美好生活还与“他者”即别人、别的单位、别的行业甚至是别的国家进行比较。很多时候,人们不是将生活跟自己的过去相比,发现当下生活的“美好”;而是跟他人的生活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9-10页。

比，看到自己生活中的“不美好”。马克思曾经以住房为例对此作出生动的分析：“一座房子不管怎样小，在周围的房屋都是这样小的时候，它是能满足社会对住房的一切要求的。但是，一旦在这座小房子近旁耸立起一座宫殿，这座小房子就缩成茅舍模样了。这时，狭小的房子证明它的居住者不能讲究或者只能有很低的要求；并且，不管小房子的规模怎样随着文明的进步而扩大起来，只要近旁的宫殿以同样的或更大的程度扩大起来，那座较小房子的居住者就会在那四壁之内越发觉得不舒适，越发不满意，越发感到受压抑。”^① 随着社会交往和信息技术的发展，美好生活需要的这种比较特征愈加强化。人们能够更为迅速、清楚地掌握他者的美好生活状态，美好生活的“历史水平线”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与此同时，生活中的“不美好”也在这种背景下加倍暴露、凸显出来，成为不堪忍受的对象。

3. 一些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没有被广泛认知

人既是生理的存在，也是心理的存在，还是心灵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把幸福“规定为灵魂的一种特别的活动”，认为它是一种“高尚〔高贵〕行为”^②。即便是被称为快乐主义幸福观鼻祖的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也认为，幸福除了肉体无痛苦外，还需要灵魂的宁静。没有内心的宁静，没有精神的诗意，就不是真正的幸福美好生活。现在中国人普遍认识到生理、心理层面的满足对于幸福美好生活的重要性，很多人还认识不到幸福美好生活最为根本的是要让心灵得到安顿、精神拥有家园。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一些人没能感到幸福美好乃至感到不幸福、不美好的重要原因。黑格尔曾经深刻地指出：“时代的艰苦使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平凡的琐屑兴趣予以太大的重视，现实上很高的利益和为了这些利益而作的斗争，曾经大大地占据了精神上一切的能力和力量以及外在的手段，因而使得人们没有自由的心情去理会那较高的内心生活和较纯洁的精神活动，以致许多较优秀的人才都为这种艰苦环境所束缚，并且部分地被牺牲在里面。”^③ 这大抵也可以用来解释刚刚走出物质贫乏时代的中国人，对美好幸福生活的理解为什么大多比较感性和物化。但是，我们毕竟经过“富起来”，已经进入“强起来”阶段，“强起来”就意味着人民生活水准全方位的提升，以往被相对忽视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因素甚至是更根本的因素应该得到凸显。否则，不懂得美好生活的真谛，就谈不上实现美好生活。

4. 在自在状态下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永远没有止境

“美”和“好”从来都是相对的，总是有程度之别的。“美好生活”亦如此。“美好生活”虽然并非一个文学概念，而是一个严格的伦理学、政治哲学概念，但中文情境下的使用事实上激发了人们的丰富想象，打开了一个无限延展的可能空间。然而，生活和历史的经验都告诉我们，有美好和更美好，但不会有最美好。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④。一定程度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促成现实的美好生活，但现实的美好生活又总是生成新的、更高的美好生活需要。同时，作为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另一方，不平衡不充分其实是发展面临的永恒问题，通过不平衡不充分到新的平衡充分再到新的不平衡不充分，如此往复，螺旋式前进，发展才成为可能。否则，彻底、绝对的平衡和充分也就意味着发展的停滞或终结。因此，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可能被绝对地满足，对此应有清醒认识和充分心理准备。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没有终点，永远在路上。当然，从较低层次的美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345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26页。

③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59页。

好生活需要到较高层次美好生活需要的转变，本身就是美好的。而且事实上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深层、强劲而持久的动力。

5. 不同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既有共同的一面也有冲突的一面

同为中国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天然具有相通、相同的方面。然而，矛盾无处不在，当前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存在着“人民内部矛盾”，而且有时还比较激烈。不可否认，由于社会阶层、群体的高度分化，利益多元化、价值观多样化成为客观事实，利益冲突、价值观矛盾在所难免，不同阶层、群体、个人从自身出发对美好生活的诉求时有冲突。例如，生活中常见所谓“邻避效应”——人们反对将有可能损害身体健康、环境质量、资产价值也即有可能妨碍自己美好生活的设施（如化工厂、核电站、垃圾场、殡仪馆等）建设在自家附近，但并不反对其建在别处。再如，北京为了本地居民的美好生活而大规模疏散外来务工人员，其实外来务工人员正是为了自己及家人的美好生活才来到北京。凡此种种，客观上凸显出一个“谁的美好生活”的问题，“美美”矛盾、诸善冲突的问题。大家都追求美好生活，结果却因为各自的美好生活之间存在冲突而美好不起来。在某种意义上，这就是从主体角度理解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它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甚至可以认为，这是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展现，而对它的解决也成为进一步推动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

三、正确引导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

美好生活概念的模糊性和在中国当前现实中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复杂性表明，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有一个如何满足的问题，还有一个如何正确引导的问题。较之满足，引导甚至是更具前提性的向度。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并非如一些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只是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次要方面，只需或只能被动、消极地等待满足。相反，它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是否能够真正走向美好，也规约着发展的取向与内容。有什么样的需要，就有什么样的发展。从而，美好生活需要在相当程度上形塑了社会主要矛盾及其破解之道。遗憾的是，现实中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往往是未经反思和批判的，不同程度地包含不合理的因素与内容，甚至可能存在虚假和错误的“美好”生活需要。慎思明辨，抓住本质和关键，为人们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生活提供精神指引和智慧启迪，这正是新时代思想文化工作新使命的重要内容。

1. 引导人们从理论与现实角度正确理解“美好生活”及其“需要”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实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我们党的奋斗目标，这是一个科学判断和一项庄严承诺。何为美好生活，需要从理论上进行科学梳理和系统论述，以正本清源，引导人民严肃认真地对待幸福、美好生活诉求。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并不是天然合理的，也不是永远合理的，更不是绝对合理的，因而，必须始终加以批判性考察。建构关于美好生活及其需要的科学理论，以之分析当前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进而引领人们自觉地在日常生活中对自身的美好生活需要展开反思，对于这种需要的更好实现必定富有裨益。同时，历史性是人之存在的基本规定性，也是美好生活的基本规定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一定是以既定的历史条件为前提的，超越历史阶段和现实条件的“需要”及其“满足”都只具有抽象的可能性，不具有现实的可能性。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尽管我们已经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但我国仍然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现实没有改变，这依然是我国最大的国情和最大的实际。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满足，

必须牢牢立足于这样的国情和实际，尽管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但只能相对而非绝对地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或者说，人们只能一定程度地实现自己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因此，当我们谈到人民对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以及尊严、体面、自由等方面的新需求时，不宜超越历史阶段，把人们的胃口吊得高高的，而应该实事求是地向人们讲清楚，避免使美好生活需要（needs）被理解为美好生活“想要”（wants）。在此基础上，校正、塑造和提升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使之达至更高的合理性与现实性，这是我们必须长期秉持的理念与坚持的原则。

2. 引导人们更加注重自身的全面发展以获得幸福美好生活

古今中外的思想家都反对将幸福美好简单地等同于物质满足的快乐，而是强调人内在素质、境界的重要性。康德“德福一致”的思想对于当代人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他认为，人要获得幸福生活，就必须具备与之相匹配的德性与能力。也可以说，只有自觉地全面发展自身，才配得上真正的美好生活。真正的幸福美好来自人的德智体美等各方面充分、自由、和谐、整体的发展即人的全面发展，或者说，人们对幸福美好的追求归根到底是对人的全面发展的追求——这也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幸福美好生活的真谛所在。面对目前人们容易对幸福美好生活作感性、物化、外在理解的实际情况，我们要更多地强调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内涵，强调美好生活对人的精神文化素养的要求，使人们深切地体察到，只有不懈提升增进美好生活的素质与能力才能达到美好生活。当然，对美好生活不能只有意愿、停留于向往，而必须使自身的素质、能力即本质力量对象化，实实在在地改变尚不完美的世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人人都追求幸福美好的生活，但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幸福美好生活不会从天而降，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一切幸福美好都要靠奋斗实现，“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①。而且，奋斗本身就是人的发展过程，被正确理解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3. 高度重视大众文化对人们美好生活的影响

我们所生活的现时代是一个无远弗届的大众文化时代。以媒体特别是新媒体为载体的大众文化时时处处无缝地满足着大众的精神需要，对大众的认知、理解、价值观产生着最贴近而深刻的影响，当然也就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以及诉求的维度、层次和缓急。不认真应对大众文化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形塑，就不可能引导人们生成合理的美好生活需要。当前，大众文化普遍存在过于商业化、娱乐化、虚拟化的问题，一定程度地扭曲了人们的生活需要，甚至有些极端消极的大众文化还起到一种反向“启蒙”作用，使人沉湎于一种没有激情的感性，一种貌似理性的麻木不仁。我们必须下大气力真正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作用，统摄、引导、借助大众文化，帮助人们形成具有更高合理性的美好生活需要。其中，特别需要呼唤一种新感性（New Sensibility）启蒙，超越缺乏激情的旧感性和缺乏人文的旧理性，使人们恢复生命感受力，提升理性反省力，重塑生活审美力，从而唤醒人们追求和创造真正美好生活的能力。马克思曾经说，人是感性、对象性的存在物，也是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②。这种再度启蒙的感性，必将是人们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美好生活的强大力量。

4. 引导人们在实现中国梦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生活

从亚里士多德到马克思都认为，真正的幸福美好生活只有在共同体中才能实现。在共同体之外，人的生存都成问题，更遑论幸福美好生活。当然，“虚幻的共同体”并不能让人迎来真正的美好生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26页。

活,唯有“真实的共同体”才能使人达成所愿。在当今中国,因为利益、价值、兴趣多样化而存在“各美其美”“美美”冲突的情况下,更需要一种超越个人对幸福美好生活追求的共同幸福美好生活的追求,即超越“诸善”的“公共善”,那就是以共同的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國力量来凝聚和维系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共同创造幸福美好的生活。对于中国人民而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追求伟大复兴的中华民族,是当前最真实的共同体,从而也是最有益于实现人民美好生活的共同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内在一致。在这个共同体的发展和复兴过程中,人们的美好生活需要也得以满足和升华。为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就是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将个人对美好生活的创造有机地融汇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中,是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的基本路径。同时,“国家富强,民族复兴,最终要体现在千千万万个家庭都幸福美满上,体现在亿万人民生活不断改善上。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①。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创造自己的幸福美好生活,也就为民族复兴贡献了力量。中国人民实现美好生活之日,也就是中华民族通达伟大复兴之时。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不同于当今世界上的其他执政党,她不仅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也为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始终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崇高使命。在世界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人类比以往任何时候面临更多共同风险挑战之际,中国共产党从自己的初心和人类整体利益出发,首倡和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就意味着,我们所理解的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具有了更为广泛、丰富的内涵,即让全世界人民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是中国共产党奋斗目标的题中应有之义。当然,立足中国当今的现实国情以及复杂的世界局势,如何实事求是地处理好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关系,还是一个亟待研究的重大课题。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北京: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6年。
- [2]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年。
- [3] 《康德著作全集》第5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
- [4] [美]赫伯特·马尔库塞:《审美之维》,李小兵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 [5] [英]弗格森:《幸福的终结》,徐志跃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 [6] 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
- [7] [印度]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任贻、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
- [8] [德]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北京:三联书店,2006年。

(编辑:刘影)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54页。